

# 《文史哲》 与中国人文学学术编年 (1951—2011)

郭震旦 编撰



NLIC 2970712258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史哲》  
与中国人文学学术编年  
(1951—2011)

郭震旦 编撰



NLIC 2970712258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11/  
郭震旦编撰.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8322-5

I. ①文… II. ①郭…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编  
年史—中国—1951～2011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533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  
(1951—2011)

郭震旦 编撰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322-5

---

2011年5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3/4

定价：34.00元

## 摘 要

《文史哲》杂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60年来,《文史哲》秉承“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勇于引领学术风尚,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20世纪后半期乃至21世纪前十年文史哲领域各种学术思潮的领导和参与者,《文史哲》杂志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风风雨雨和起起落落,更以其卓然不群的学术水准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刊物。《文史哲》杂志的历程,最能折射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

# 目录Contents

|                  |                  |
|------------------|------------------|
| 1951 年..... 001  | 1966 年..... 128  |
| 1952 年 ..... 017 | 1967 年 ..... 130 |
| 1953 年 ..... 028 | 1973 年 ..... 131 |
| 1954 年..... 036  | 1974 年 ..... 135 |
| 1955 年 ..... 056 | 1975 年 ..... 137 |
| 1956 年 ..... 070 | 1976 年 ..... 138 |
| 1957 年 ..... 082 | 1977 年 ..... 140 |
| 1958 年 ..... 094 | 1978 年..... 144  |
| 1959 年 ..... 101 | 1979 年..... 148  |
| 1961 年 ..... 102 | 1980 年..... 153  |
| 1962 年 ..... 105 | 1981 年..... 158  |
| 1963 年 ..... 110 | 1982 年..... 163  |
| 1964 年 ..... 116 | 1983 年..... 169  |
| 1965 年 ..... 123 | 1984 年..... 175  |

1985 年..... 179  
1986 年..... 185  
1987 年..... 191  
1988 年..... 197  
1989 年..... 203  
1990 年..... 207  
1991 年..... 211  
1992 年..... 217  
1993 年..... 221  
1994 年..... 226  
1995 年..... 231  
1996 年..... 237  
1997 年..... 244  
1998 年..... 252

1999 年..... 265  
2000 年..... 273  
2001 年..... 281  
2002 年..... 290  
2003 年..... 303  
2004 年..... 315  
2005 年..... 324  
2006 年..... 331  
2007 年..... 349  
2008 年..... 356  
2009 年..... 365  
2010 年..... 375  
2011 年..... 388

## 1951 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风气为之一变。

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毛泽东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其后，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接受新思想教育。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学术界迅速掀起宣传学习的热潮。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传》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开以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之先例，形成了此后一系列思想与政治批判的模式。这次大批判的后果是在思想文化界确立了革命意识形态，把改良主义打倒在地。

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开始确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4月出版发行。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在教育界、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发动思想改造运动。

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和教育家华岗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山东大学创建于1901年，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为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坐落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就迎来了第一次辉煌，学校奉行“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一时间人才荟萃，名流云集，杨振声、闻一多、黄敬思、黄际遇、任之恭、傅鹰、沈从文、梁实秋、闻在宥、游国恩、曾省、汤腾汉、老舍、洪深、张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著名学者都在这里执掌教鞭。可谓群星璀

璨，秀冠群伦。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率领军管小组进校，对学校进行接管整顿，山东大学从此进入新的时期。

1945年，中共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1945年8月，山东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区临沂，创办了山东大学（为了区别国立山东大学，称“临沂山东大学”）。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济南解放后，华东大学于11月迁入济南。1950年冬奉命迁青岛。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建立的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1万名干部。

1951年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称山东大学。华岗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童第周、陆侃如为副校长。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分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病虫害学、政治学、艺术学18个系。

华岗，1903年10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今衢县）。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6月，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历任青年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和顺直（河北）省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

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主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党中央华北巡视员。1943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1945年8月，任国共谈判中央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1947年3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一起撤到延安。1949年9月，华岗应召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因病滞留青岛，被安排以山东大学教授身份讲授“社会发展史”。1950年4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合校后的山东大学迅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华岗既是革命家又是理论家的独特禀赋也很快体现在山东大学的办学风貌上。紧紧跟随新生政权的前进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成为山大人的共同追求。为了提高全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华岗利用政治大课的形式，向全体师生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用唯物历史观点和科学方法来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整个山大人的共识。同时，新生的山东大学还把重点放在了锻造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色上面。早在合校之初，具有战略眼光的华岗校长就已经开始考虑山东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布局。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1952年11月，华岗会同童第周、陆侃如两位副校长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自己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半年后，高教部指示各直属高校，研究并确定本校的重点学科与发展方向，山东大学遂将中文、历史等专业

上报。从此，“文史见长”成为山东大学的学术名片而享誉海内外学界。

这一时期的华岗还把重点放在大力延聘学界名流上，除新中国成立前旧山东大学学术队伍的老班底完整保留外，童书业、郑鹤生、吴大琨、赵俪生、吕荧、陈同燮、许思园、乔裕昌、张维华、高亨、黄云眉、黄嘉德、王祖农、方宗熙、文圣常、束星北、陈机、莫叶、唐世风等一大批各自领域中的一时之选也纷纷踏进山东大学的校园，其中多数是饮誉文史两界之翘楚。

新山东大学成立后，迅速由旧大学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转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时成为风尚。据时任山东大学军代表的罗竹风回忆：“遵照中央指示，新解放区的高等院校开设两门政治课：一是社会发展史；二是新民主主义论。两门政治课都是全校性的大课，华岗讲社会发展史，我讲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学习毛泽东同志新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除政治学习外，还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项政治运动，山大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很快地就和党的方针政策‘合拍’了。这是不难设想的，在国民党暴政熬煎下，一旦解放，便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大家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了。”（罗竹风：《回顾以往，激励未来》，《文史哲》1986年第5期）

新山东大学容纳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学统和学派，具有雄厚的古典学术研究力量。同时又以与华东大学的合并为中介很快地接受了新观念、新思潮。彻底扔弃旧包袱的社会主义新学术思想和济济一堂的杰出文史人才，为《文史哲》的创办准备了优良的条件。

5月1日，《文史哲》杂志创刊。

《文史哲》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伊始，《文史哲》就以“百家争鸣”为办刊原则，勇于引领学术风尚，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20世纪后半期乃至21世纪前十年文史哲领域各种学术思潮的领导和参与者，《文史哲》杂志见证了当代中国学术的风风雨雨和起起落落，更以其卓然不群的学术水准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刊物。《文史哲》杂志的历程，最能折射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

新成立的《文史哲》杂志是同人杂志，由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著名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那时，数以十计的文科骨干教师，都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组织者、撰稿者。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刊物的审稿、改稿、校对、发行等一系列工作。靠着文科广大教师热爱刊物的一顆心，《文史哲》才得以顺利地降生和茁壮地生长起来。”（萧涤非：《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文史哲》1986年第5期）

《文史哲》自打创刊，就把“扶植小人物”当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大力发掘和推举学术新秀。社长华岗规定，《文史哲》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与现实相关的文章。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从《文史

哲》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张传玺、葛懋春、汤志钧等著名学者的成长足迹均在《文史哲》的历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中具有特殊标记——由《文史哲》推出——的一个学术群体。改革开放以后，《文史哲》杂志继续恪守“扶植新人”的办刊方针，又培植了大量学术新秀，把包括山东大学大量青年教师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新秀推到了不同学科的前沿地带。《文史哲》杂志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

“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林志纯）、阴法鲁、任继愈、季羨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6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羨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

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这一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史哲》杂志上。《文史哲》创刊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

史问题的文章，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51年初秋，华岗同志作为山东大学上任不久的校长，他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邀请，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请会上，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都应当仿效。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随时将成果公之于众，而校刊、学报正是传播的最好工具。”（罗竹风：《回顾以往，激励未来》，《文史哲》1986年第5期）正是因为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当时的《文史哲》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注意。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曾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来函要求山东大学赠送《文史哲》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以代表国家进行书刊交换。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东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交换《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来函要求山东大学以图书馆的名义向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古川道雄等学者赠送《文史哲》，并来函同意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国年鉴》等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文化领域相对隔绝的时代，《文史哲》充当了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为中国文化步出国门、让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国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史哲》对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创刊之时，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纷纷停刊，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杂志只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以及1951年1月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研

究》要迟至1954年才创刊,《学术月刊》是更后面的1957年创刊,著名的《北京大学学报》是1955年创刊,《文史哲》创刊时学术杂志可谓寥寥无几。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须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学术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问世,就超越山东大学的围墙,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学术中心,从而一举奠定了《文史哲》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的领先地位。“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罗竹风:《回顾以往,激励未来》)这一点从《文史哲》不断攀升的发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创办时期,邮局拒绝发行,编辑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销。1953年后,销路大增。1954年时,印数已达1.3万册。1955年,这一数字又激增至2.7万册。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发行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邮局征订数飙升至70多万册(但因纸张供应不足,仅限量发行24万册)。“文革”结束后,发行量长期稳定在3万—4万册。迄今,《文史哲》发行量仍居全国同类社科期刊之首。

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60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在她迄今60年的生命里程中,50年代发起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80年代发起“文化热”大讨论,90年代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的大讨论,近几年发起的“疑古与释古”大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无不声势

浩大，风起云涌，谱就了60年来中国学术史上的华彩乐章。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新中国成立后17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也是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的。

《文史哲》素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讲话中将《文史哲》作为高校学报国际化的典型予以嘉许。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于友先在《百刊风采：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巡礼》（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序言中还对《文史哲》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说：“可以理解一本《考古》或《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对一个学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意义。”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

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杨向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文章对考证与理论指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胡适考据学的局限性，并提出要在历史研究中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武器，站稳阶级立场。这一要求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研究正在从民国考据学向唯物史观史学的转变。作为《文史哲》首任主编，杨向奎大部分学术生涯都与《文史哲》紧密相连，共在《文史哲》上发表了51篇学术论文。

创刊号上还刊登了华岗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孙昌熙的《鲁迅与高尔基》两篇文章，开新中国鲁迅研究之先河。后又在1951年第2至4期和1952年第1期的《文史哲》上连续刊发了华岗的《鲁迅论中国历史》、《鲁迅论科学》、《鲁迅论文艺》、《鲁迅论妇女问题》等文章，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等也在《文史哲》发表了大量的鲁迅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一期的杂志上还刊载了郑鹤声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该文系作者应南京博物院之约，对洪秀全的面部特征作了详尽的考证，特别是对他长没长胡子进行了追考。1958年“史学革命”期间，该文受到批判，被当成烦琐考证的代表。